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九八期 ——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7b)

【资料汇编】文革中的七月	唐 郎
【史海钩沉】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王年一
【史料考订】对陈益南《文革中若干尚不清楚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问题》 的一点更正	闻于樵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五)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资料汇编】

文革中的七月

• 唐 郎 •

◇ 一九六六年

7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家乡给江青写了那封在林彪垮台后公布于世的信。(全文见本刊 zk 9609a ——编者)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从1965年底开始，毛泽东离开北京一直在外地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后，突然回到北京。当晚，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看了有关学校的材料后，针对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发表谈话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7月19日至23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由刘少奇主

持。会议期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批评了工作组和派工作组的做法。22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中央局书记时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斗批改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23日下午，刘少奇在会议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争辩，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大多数工作组还是好的，问题是方法不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方式。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宣部改组，由陶铸任中宣部部长。

7月22日至2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江青四次来到北京大学，主持北大全校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26日晚，陈伯达在大会上宣布撤掉北大的工作组，罢掉北大工作组组长张乘先的官。并说，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毛泽东亲自听了北京大学辩论会的录音，并看了辩论会上递的条子，明确表示支持反对工作组。

7月24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研究工作组问题时，再次否定了工作组，表扬了中央文革。毛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障碍，要立即撤出。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同日，周恩来就派工作组一事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说：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点感性知识。

7月27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批判工作组大会，康生在大会讲话中声称彭真试图制造“二月兵变”。康生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1966年7月初，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了一张名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认为在2月份时有外地部队调到北京来，是“彭真、刘仁企图搞政变的准备”，从此开始有了“二月兵变”的说法。随后，康生又在中央文革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此后，“二月兵变”成为贺龙被立案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指出：“1966年7月前后，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捏造的谣言。”）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撤销各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决定说：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全文见本刊zk0111d——编者）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在大会上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刘少奇最后讲话，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我也不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除工作组。”（全文见本刊zk0111d——编者）

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从此，血统论的观点喧嚣一时。

◇ 一九六七年

7月4日，广西赴京两造反派在北京达成《十条协议》，主要内容是：贯彻中央六六通知和六二四通知；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对方人员；坚守生产岗位；不准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准夺枪、开枪，由军区监督收回各单位现有枪支。周恩来指示，请广西两派和广西军区以明电和电话发回转告全区照办。

7月9日，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全院师生员工工作检讨。这封检讨是中共中央要求刘少奇必须作的，但刘少奇在检讨中还是对自己在1966年5月至7月间的行为作了辩护。其中说：“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应当是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7月10日，中共中央就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坚持报告》作出批示，说：河南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当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

7月11日，北京50所高等院校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这次大会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起并主持的，大会发言提出：复课闹革命，是把革命的大批判同本院校的斗批改结合起来的重要措施；是加强革命师生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建立革命性秩序的重要保证。它将有力地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复课闹革命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陈伯达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此后，复课闹革命代替了停课闹革命，学校秩序开始恢复正常。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通知》说：“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方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

7月14日至8月下旬，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抢夺武器弹药，发生武斗。7月14日，广西“联指”组织红卫兵到广西军区警卫连和自治区党校分部驻军6984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300余支、轻机枪3挺、六0钢炮一门和一批弹药。8月18日，广西另一派组织“四二二”在金鸡村抢劫军用列车，抢走援越炮弹4000多发。20日，中央文革小组去电责令交还，“四二二”将大部份炮弹交还部队。在同一天，广西南宁“联指”指挥部决定，晚上攻打东方红医院和民族电影院等“四二二”据点，医院被严重破坏。武斗中，“联指”方面死一人，“四二二”死九人，多人受伤。武斗结束后，“联指”将10具死尸当作本派被“四二二”杀害的证据，现场陈尸展览。在两大派多次发生严重武斗的情况下，8月24日，周恩来再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要求双方停止武斗并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

7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礼堂召集北京47所大专院校群众组织负责人会

议。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中央文革小组要求“立即掀起对刘邓路线及一小撮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的大批判高潮”。此后，批斗走资派的活动进一步升级。

7月17日，中央军委4人小组成立。这个小组又称看守小组，成员有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吴法宪任组长。它是军委办事组的前身，任务是负责看管总政和驻京部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7月18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由于刘少奇7月9日的“检讨书”没有得到通过，从13日开始，几十万造反群众在中南海西门和周围安营扎寨，要求批斗刘少奇。这次行动到8月5日在天安门举行“声讨刘少奇大会”达到高潮。

7月19日，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批斗，被打成重伤。20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了彭德怀。26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又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张闻天被拉来陪斗。批斗会结束后，彭德怀和张闻天又被押上卡车在北京城游街。

7月20日，在武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七二〇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来自部队的干部直接反对中央文革的一起最大规模的行动。1967年初，武汉市成立了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一派叫做“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为“百万雄师”；一派叫做“工人总部”，后又称为“三钢三新”（“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在“支左”运动中，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1967年3月17日，武汉军区和武汉公安机关逮捕了“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等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布《通告》，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及所属组织。从1967年4月底到5月初，武汉的两派群众组织多次发生武斗，双方死伤频频。6月26日，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出电报，指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六六通令》严肃处理。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来到武汉；同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也从重庆飞抵武汉，参加解决武汉问题的工作。15日和16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研究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钟汉华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18日晚，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确立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一、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二、“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当晚，周恩来飞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人在送完周恩来回来的路上，直接去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透露了夜晚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19日下午，谢富治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宣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导致部队和“百万雄师”对谢富治和王力的极大不满。20日清晨，武汉军区独立师8210部队和“百万雄师”分乘上百辆卡车，冲入谢富治、王力所住的东湖宾馆，抓走王力，把王力的踝骨打断。随后，8210部队和“百万雄师”还出动数千辆卡车排成四路纵队，举行浩大的游行示威。20日下午，周恩来再次飞抵武汉，指挥部队把毛泽东转移出武汉；同日，林彪又向武汉增派部队。事件后，陈再道和钟汉华被撤消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百万雄师”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独立师8210部队被打成“叛军”被取消番号予以解散。湖北省掀起了大规模的清查批斗，全省被打死打伤者达18.4万人。与此同时，报刊上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为“七二〇事件”及由此受到迫害的人员平反。）

7月22日，江青发表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这天，江青在接见河南的一个群众组织时说：

“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当你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7月23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的口号。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的代表时，又说：“‘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中共中央办公厅于9月9日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9月5日讲话。于是，各地纷纷成立所谓“文攻武卫指挥部”、“文攻武卫战斗队”等专门武斗组织。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王力、谢富治（从武汉经历“七二〇事件”回到北京的）大会上，对肖力（即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此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受到严重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砸烂总政阎王殿”而造成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被长期关押、受残酷批斗的干部达760人，其中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等17人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21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7月25日，康生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负责人时，再次提出要深入批判“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三降一灭”是毛泽东和康生强加给王稼祥和中联部的一条罪名，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简称。1962年2、3月间，王稼祥几次提出我国的外交路线应该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方针，这被毛泽东和康生指责为是“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的简称）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又说：“‘三和一少’不够了，应该叫‘三降一灭’。”后来，康生又提出“三斗一多”的外交方针，即：“对帝、修、反要斗，支持各国革命运动要多”的简称，并由此导致了“八二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的发生。

7月25日，浙江温州市商业中心区五马街发生大火，共烧毁房屋2000多间，使繁华的温州成为一片废墟。这次大火是由于温州两派群众组织“工总司”和“温联总”双方武斗造成的。其起因一说是“温联总”用火攻“工总司”据守的据点而成，一说是“工总司”自己放火来嫁祸于“温联总”。其结果是导致浙江省军管会另派军队来温州，并造成部队与部队之间的激烈内战。

◇ 一九六八年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制止广西武斗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布告》要求：“一、立即停止武斗，撤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运输。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7月21日，广西博白县文地中学党支部书记刘振武，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论的意见》，投寄玉林军分区。刘振武在传单中直陈己见，反对派性，结果被作为“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案件”，于同年8月12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9月20日在狱中病逝。县公检法军管会将刘振武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1984年2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报民政部批准，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

7月21日，毛泽东在《文汇报》和新华社记者写的一篇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中，加上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篇调查报告于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的这段话后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按“七二一指示”的精神，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培养技术人员的办法称为是走“七二一道路”；工厂创办的学校和业余大学就叫做“七二一大学”。至1972年，全国有“七二一大学”68所，学生4000余人；1976年7月21日，新华社报导：全国“七二一大学”从1975年上半年1200多所9万多人猛增加到1万5千多所，78万多人。（1978年3月20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此后，各地都对“七二一大学”进行了调整整顿，“七二一大学”被改办为业余大学、业余中专、技校或职工大学。1984年上海机床厂党委决定，彻底否定《七二一调查报告》，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制止武斗的《布告》，即“七二四布告”。《布告》特别重申中共中央的要求：“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撤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有确凿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7月27日，北京3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工宣队”是毛泽东为制止“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消除“红卫兵”的影响而派出的。当天上午，由数千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在进驻清华大学过程中，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决定进行抵抗还击，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

7月28日，毛泽东在凌晨3时半到8时半，紧急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五大红卫兵领袖”，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问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毛说：今天是找你们来谈制止大学武斗的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有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针对蒯大富声称要抓“工宣队”的“黑手”，毛泽东还愤怒地说：我就是工宣队的黑手。陪同这次接见的还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

◇ 一九六九年

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由毛泽东亲自签发和修改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7月11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报告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比美国大;苏联虽然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下不了决心,也并无把握,它最大的战略顾虑在美国的态度,担心中美联合对付苏联。这封报告对其后毛泽东决定缓和中美关系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

7月23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为制止武斗发布的最重要的布告之一,简称“七二三布告”。《布告》说:“九大”后,“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份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二、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为此,中央决定:一、重申过去发布的布告和通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撤除武斗据点,放下武器,由解放军集训;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实行追捕,归案法办。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五、不得霸占银行、仓库、商店,要严办抢劫主犯,追回物资。六、对杀人放火等现行犯罪分子,应发动群众检举,交群众家家户户讨论,依法惩办。七、对回本单位的人,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八、分裂大联合、破坏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中央概不承认。

7月25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北京、河北等9省市《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简报。当时,这9个省市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计划的47%。从简报反馈的情况来看,除钢、水泥、化肥等少数产品外,其他主要工业品,包括轻工业品的产量,都比1966年同期有了显著增长;石油等还创了历史最高记录。这表明,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生产下降的趋势已经得到全面制止,经济建设又开始得到发展。

7月29日,当时西南地区正在建设中的最大的火电厂——贵阳清镇电厂发生严重武斗,一派群众组织调动1000余名武斗人员围攻据守电厂的另一派群众组织,武斗中使用轻、重机枪和炮,双方伤亡约数十人。

◇ 一九七〇年

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社论公布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

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针织总厂运用“七字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北京针织总厂在8341部队宣传队的帮助下,创造出了“看、想、问、议、用、写、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七字经”。看:就是要认真地带着问题学。想:就是“多思”,多问几个为什么、怎么办。问:就是向领导和同志请教。议:就是大家一起议论。用:就是实践。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用”字最重要。写:就是把学习和运用中最主要的体会更加深刻、更加有条理地写出来。查:就是总结报告。“七字经”当时被作为六厂二校经验在全国作重点宣传推广。

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试图恢复共青团在学校中的地位,削减红卫兵在校园中的影响。

7月29日,毛泽东在接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谈到“文化大革命”说:生产下降了些,打得厉害,一个工厂分两派,互相打呀!这一条我们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料到,怎么每个工厂都分两派呢?怎么动不动就打呢?……有些是有坏人在那里挑拨。那些人就是国民党,趁此机会名为造反,在北京砸、烧英国代办处,印尼、印度的大使馆也遭殃了。……这样坏人就暴露了,所以我们说,清理阶级队伍就搞这几件事。

◇ 一九七一年

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

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针对当时外事宣传工作中赠送毛泽东像章、宣传毛主席语录的做法。毛泽东批示说:“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 一九七二年

7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由中央专案组7月1日提出。同日,中共中央还印发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时说,自己没有改变世界多少,改变了一点,十个指头改变了一个指头,把这个北京改了一改。最近我们又把一个姓林的,叫林彪,也把他改造了。这个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说我怎么了不起,而实际呢,就要杀我的头。跟他斗争了几十年,后头变成了“亲密战友”、“副统帅”。结果庐山会议到去年,一年多他就呆不住了。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

◇ 一九七三年

7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务院科教组《关于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办学几个问题的意见》。此后,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停止招生的中专、中技学校恢复了招收新生。

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批评外交部和周恩来。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更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总结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 一九七四年

7月12日，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批示“批林批孔”应该从娃娃抓起。说：“中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该抓紧些。要抓典型，以点带面。如不及时抓紧，对青少年、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针对少年、儿童编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能使一个人从儿童、少年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孔老二，值得深思”。此后，根据这份批示的精神，在中、小学的教材上增加了大量尊法反儒、儒法斗争的文章。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开设“两个工厂”，首次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毛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总而言之，她（江青）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通知》说：《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湘剧《园丁之歌》是柳忠甫等根据花鼓戏《好教师》改编而成；1973年4月，根据华国锋的指示，拍摄成电影。《园丁之歌》主要表现了教师忠于教育工作，反映了学生不好好读书，教师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现象。1973年7月28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审查此片时，江青曾说：“园丁应该是共产党员，怎么能是教员？是知识分子？”1974年6月14日，江青批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于此，国务院文化组发出了这份《通知》。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批判《园丁之歌》。此后，全国开始围剿《园丁之歌》。

◇ 一九七五年

7月12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赵高复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儒家势力存在，社会就得不到安宁》两篇文章，这是评法批儒运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

7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云岭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要搞清楚——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札记》。这是江青等人提出反经验主义的一篇重要文章。

7月14日，毛泽东就调整文艺政策作书面谈话。说：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看不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处份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详见《邓小平文选》（一）。

7月15日，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要求要抵制江青等人试图对军队的影响。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全力贯彻会议精神，经毛泽东批准，采取了防止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重要措施，调整配备了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

7月18日，电影《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在邓小平的指使下，向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文化部核心组批评《创业》的十条意见表示不同看法，建议《创业》重新上演。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的来信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这份批示，使江青等人受到重大挫折。

7月29日至8月4日，云南发生了回民护教被部队武装镇压的“沙甸事件”。沙甸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鸡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是回民聚居的村庄，全村有回族1578户，7549人。“文革”初期，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以“破四旧”为名，强行关闭清真寺，抄毁焚烧伊斯兰教典籍，不尊重回民生活习俗，引起回民强烈不满。此后，云南各级领导在执行“划线站队”政策中，又派武装进驻该地，批斗当地干部、群众，采取了一些严重侮辱回民、伤害回民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作法，激化了回民护教情绪。后来沙甸等地回民群众提出开启清真寺和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等合理要求，对此，云南各级领导采取压制态度，激起民族之间和群众之间的武斗，最后导致使用武力镇压回民，造成极为严重后果的“沙甸事件”。（197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发出《关于沙甸事件平反通知》，说：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正式撤销，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对被打死和错杀的群众要一律平反，并给予家属、子女抚恤，伤残的给予治疗或救济。1987年8月，中共云南省委又撤销了《通知》中个别的不正确的结论，“沙甸事件”得到彻底平反。）

◇ 一九七六年

7月6日，朱德去世。

7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七期署名高路、常戈的文章《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文章大意是说邓小平要把我国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

## 【史海钩沉】

### 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 王年一 •

“安亭事件”是上海“工总司”成立后制造的一个卧轨事件，是搞垮上海市委的一个严重步骤。其概况是：

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会上，诬陷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声言“我们要夺权”。会前，王洪文等人强要市委书记曹荻秋等到会。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文件的精神，并经请示中央文革，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这一正确态度，被王洪文等人诬为“压制革命造反”、“资反路线对工人的迫害”。11月10日凌晨，他们煽动一部份“造反队员”（“工总司”的成员）冲到上海北站强行登车，要到北京“告状”，中午，又在安亭车站（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站）卧轨拦截了14次特快列车，造成沪宁线全线停车。

事发后，上海市委立即要求并组织人员去安亭劝说“造反队员”回厂。11月11日，陈伯达发电报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动员工人回厂，又发电致在安亭的工人，要求他们回厂。当天晚上，张春桥乘飞机赶到上海，直奔安亭，向潘国平等头头出示了陈伯达起草的电文原稿，要工人们返回上海，有问题回上海去谈。12日，大部份“造反队员”由各单位派车接回，上海市委还专门发了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的“造反队员”做好团结工作，“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

13日下午，“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要张春桥参加。张在去文化广场前，参加了市委常委会，研究了王洪文等人可能提出的要求，并同曹荻秋一道，打电话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一致意见：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而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到文化广场后，即擅自签名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一）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去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工总司”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由此，“工总司”成为在上海主宰一切的太上皇。

中共上海市委确定“三不”（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是有根据的，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图办事的：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8日通过），第13条规定：“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第14条规定：“……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中共中央1966年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第3条说：“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

196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复安徽省委10月16日的请示，并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连问题……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

◇ 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1979年12月8日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行车的情况》：

1966年11月10日凌晨，自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伙，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开车不久，接到上级指示：应就地解决问题，不能进京。于是由铁路领导决定将602次列车扣在安亭站。602次列车上的人员则卧轨拦车，甚至连乘有外宾的14次沪京特别快车也不让通过。这样，就将列车拦阻在安亭，造成了沪宁线行车中断。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

据档案材料，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讯问时说：“我虽然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是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传说王洪文不仅卧轨，而且带头。这可能不符合事实。

◇ 陈伯达态度明确，要工人返回上海。他在“安亭事件”事发当日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

电报全文如下：

工人同志们：

10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韩是华东局第三书记）请他们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转。刚听到消息有部份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但据说还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和党中央再三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生产岗位，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就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在注视我们，注视我们的活动，注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国家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搞好的。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这样那样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份利益，因为一部份人意气闹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陈伯达 1966年11月12日（12时）

（以上抄自北京大学新北大“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十一月份）

#### ◇ 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据档案，陈伯达1979年11月29日被讯问时说：是周恩来、陶铸派张春桥去处理此事的。

陈伯达又说：“张春桥到上海后给我打了第一个电话。他问：‘是先到上海市委去，还是先到群众中去？’我答复说：‘先到群众中去，赶快制止群众到北京来，很快把问题解决了。’”看来张春桥到上海后即去安亭，不是自作主张。

安亭的情况，幸好在现场的甄文君（当时名义上是《解放军报》记者，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当时作了报导。下面是甄文君1966年11月12日下午5时10分致周总理的电话的记录（据档案材料）：

张春桥同志和上海要求赴京工人谈话情况

张春桥同志昨晚9点多抵沪，即赴安亭车站，跟9个工人代表谈判，谈判中间有波折。9人中有3个同志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6个不同意。一直谈到天亮，未达成协议，他们坚持要步行去京。

今早7时，春桥同志又到现场找工人谈话。工人对伯达同志的信（按即电报）有意见，说只讲生产，不讲革命，他们不同意。有些人谈起来情绪激昂，进行控诉。

现在看，有少数人是坚决主张到北京的，他们起领导作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上海联络站支持他们。

第二种是多数人。他们提了5个条件，如答应他们，他们就回上海：1.承认工人造反司令部，发给袖章；2.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3.此次事件的责任在市委；4.曹荻秋要做检讨，承认错误；5.后天要开控诉大会。

第三种人，也是少数，主张应听中央的话，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领导地位。据有些工人私下谈，他们有顾虑：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个单位，除一个单位来的人很多，有300多人外，都是零星的来一些人，其中有些还是受过批评的，担心回去后被围攻、挨整。

挤在安亭的工人，生活问题市委已注意，不会出问题。

铁路交通，昨天已恢复，工人的那一列车，停在叉道上。

张春桥同志还在安亭。

#### ◇ 张春桥接受“工总司”的“五条”

糜欣祥（原为曹荻秋的秘书，后为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的工作人员）1979年12月1日在揭发张春桥的材料中写道：

1966年11月13日，张春桥从安亭回到市区，准备与“工总司”继续就承认不承认这个组织问题进行谈判。下午，华东局和市委的负责人在康平路办公楼103会议室碰头，张春桥也参加了。碰头会刚开始，曹荻秋同志要我挂电话给陶铸同志，有问题请示。在104室，荻秋同志同陶铸同志通话后，电话没挂断，又要我叫张春桥出来听了电话。我当时在旁边听了一方面的话，明确的印象是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事后证实确是这个精神）。华东局和市委负责同志一致同意陶铸同志的意见，张春桥当面并无异议。约3点多钟，张春桥到文化广场后台谈判，突然违背了中央、华东局和市委的精神，个人签名同意“工总司”的第一个“5条要求”。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上海文化广场，张春桥在潘国平同一些红卫兵草拟的5条要求上签了字，5条要求是：1.承认上海“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2.承认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以及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3.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工总司”后勤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张春桥在第二条后面加了个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以上抄自“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1967年出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

张春桥签字后，又在大会上讲话。据浙江大学红卫兵联合编辑部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

张春桥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大家在这里守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11月9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告，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出通知，你们回去后不应受到打击和责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就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回去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当你们是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像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大会后，我还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如何解决革命和生产的关係，曹荻秋同志检查时间和下次会议的准备。我希望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走到全国的前面，如同在工业上一样。

11月13日下午，张春桥还为“造反队员”题了字：“11月9日上海市工人敢于革命造反北上上革命的行动。”“上海工人革命总司令部好得很。”

据档案，1980年7月13，徐景贤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的罪行。徐景贤写道：

1969年，王洪文曾带我去看过“安亭事件”的现场，他还说：1966年他们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开过大会以后，到北站乘火车去北京告市委的状，列车到安亭被阻止以后，他们无法可想了，就决定拦住京沪线的快车，这样可以把事情闹大，让中央出来表态。当时他们拦阻的快车上还有外宾，交通中断以后，果然震动了全国，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期间，1966年11月13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后台化妆室内，和潘国平、徐美英等工总司成员以及一些红卫兵代表谈话，潘国平等说了一通以后，张春桥讲：原来在北京听到上海市委汇报安亭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中央文革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由陈伯达执笔写了一份电报；他自己赶到安亭以后，听了工人们的发言，觉得上海市委是

有责任的。至于有人现在对电报里的一些措词有意见，那是因为起草时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张说他是同情工人并站在工人一边的。

潘国平一听张春桥这样讲，就说要求张春桥签字同意由市委发一个文件，承认工总司，承认到安亭去是革命行动，一切要由市委负责等。张春桥这时根本不和当时在市委主持工作的曹荻秋同志等联系、商量，就向潘国平等表示可以。潘国平看到张春桥点头了，再和在场的几个红卫兵商量，由其中的一个起草了5条，张春桥当场签了字。随后，潘国平等把张春桥簇拥到文化广场台上，当众宣布张春桥已经签字同意5条，聚集在场内的造反派纷纷向张春桥欢呼鼓掌，张春桥又在掌声中发表讲话。

以上活动，我都在场目睹的。

◇ 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的做法：

据档案，姚文元1980年6月11日被讯问时说：

“安亭事件”是张春桥处理的，他走了后，我留在北京，在毛主席那里讨论过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事。是在游泳池或一·八，毛主席开会就是这两个地方。当时我在电话里听到张春桥汇报的主要问题是签字问题：要承认造反派是合法的。在会上毛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造反派这个事实，然后才有这个组织概念，就是说要承认它是合法的。当时是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的电话。毛主席说了后，陈伯达给张春桥打电话，把毛主席的意见告诉了张春桥，陈伯达讲完，我也说过几句，就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是个核心问题。

“安亭事件”处理完后，张春桥回到北京，在毛主席主持的会上，详细汇报了“安亭事件”的经过。

◇ 张春桥的自供状

张春桥多次洋洋得意地讲到“安亭事件”。这里且举出一次。据浙江大学红卫兵联合编辑部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张春桥1966年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上海“工总司”部份工人时说：“到文化广场我明确表示了意见。……我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说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5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5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是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的阴险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拙作《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收入张化、苏采青主编的《回首“文革”》下册）（见本刊zk0205b——编者）中有所分析，敬请参看。

□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4期

~~~~~

【史料考订】

对陈益南《文革中若干尚不清楚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问题》

的一点更正

• 闻于樵 •

《华夏文摘》增刊二八八期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七期上陈益南《文革中若干尚不清楚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问题》一文，提出了文革史上一些很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读后颇有启发。只是发现有一些不尽准确之处，特提出予以更正。

陈文中说：“196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还联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盛大的‘百万军民’大会，热烈欢迎从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安全脱险的王力……”这里，陈文把时间记错了，天安门广场大会的时间是7月25日而非30日，因此后文中的“十天之后”等说法自然也就跟着错了。

陈文中关于康生一段中说到：“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虽坐着轮椅出了一下面，并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之一……”关于王洪文一段中又说到：“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时年39岁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竟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这两处都将中共十大错写成了十一大。十一大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1977年召开的。

陈文中关于贺龙一段中，说到：“所谓‘二月兵变’的流言最开始是出自于红卫兵的小报，而起源又因要批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李井泉不仅曾是贺龙的部下，更是西南所谓“三线”战备系统工程的总指挥。当时，那个神秘神秘的“三线”则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当成搞政变搞阴谋的事了。既是搞政变的军事阴谋，当然少不了有贺龙的份了。”这个说法也不符合史实。

文革中所谓“二月兵变”，是1966年7月上旬由北京大学学生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引发的，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也贴出了同样内容的大字报，大字报怀疑当年春北京卫戍区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借房驻兵一事是彭真、刘仁的北京市委想搞兵变。此说一度被大字报、传单炒作得沸沸扬扬。据《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二月兵变”假案》辞条介绍（该书257页），邓小平8月2日在人民大学群众大会上讲话时就否定了这个无中生有的说法，而康生则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明确宣布“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不过，笔者所存文革传单《周总理、康生谈“二月兵变”》中却有另一记载，称1967年4月28日下午在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讲话中，康生说：“我顺便插一下，说‘二月兵变’，有些我不晓得，开始有些晓得，现在传遍全国，外国记者传遍全世界，‘二月兵变’具体怎么来的，为什么在二月，说法很多。……其实北大、人大也没有说是政变，是怀疑这件事，彭真要篡党、篡军、篡政是一回事，不能从这件事就说是‘二月兵变’。”周恩来也说：“据我知道没有这件事。革命群众怀疑是许可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么，是执行主席的命令么。”

陈文说“二月兵变”是因批判李井泉而引起，此说也不确。当年造反派批判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材料中，据笔者所知，并无涉及“二月兵变”的内容。笔者为此专门查了有关资料。在“红卫兵成都部队”1966年12月编印的《打倒李井泉》（第一集）中，给李井泉罗织的六大罪状中就没有此罪，只在文末“西南地区的若干问题”里提出了：“今年三月彭真黑帮突然匆匆忙忙赶到成都，会见了李井泉。与此同时，另一黑帮头子陆定一也赶到西昌。他们究竟与李井泉秘密谈了些什么？”但并未提出与“二月兵变”有关的怀疑。在“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成都军工井冈山总部”等群众组织1967年11月联合编印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李井泉在工业、交通、基建战线上的三反罪行》中，也没有这方面内容。这本资料中给李罗织的第九条罪名是“李井泉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大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其中也只字未提“二月兵变”之事、另外，在“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成都贫下中农革命

造反兵团”、“省红联四川省农业厅红色革命造反兵团”1967年12月联合编印的批判李井泉资料汇编中，给李罗织的“十大罪状”也没有一条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不过，将“三线建设”与“二月兵变”联系起来的事，当年也不是完全没有。据笔者所知就有一例，当时作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之一的“四川石油大会战”，会战领导小组曾一度奉命准备将部份职工改为工程兵编制，当时称作“工变兵”，在1967年1月夺权高潮中，“怀疑一切”思潮空前泛滥，曾有造反派对“工变兵”一事提出质疑，怀疑与“二月兵变”有关，但一开始追查就遭到有关领导干部制止，说这属于国家机密。随后又有外来红卫兵与本地造反派联合向中央军委去电询问，得到的回答也是说这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国家机密。遂无人再敢对此纠缠。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五）

• 周孜仁 •

（续上期）

#### 15，沙市纱厂险遇

前面说到，四月六日至七日，重庆市八一五派的权力机构革联会常委会作出了六条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立即调查处理沙市纱厂（即重庆棉纺六厂，下同——笔者注）等单位的问题，彻底打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凡是被保皇势力反夺了权的地方，革联会坚决支持并帮助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把权立即夺回来”。事后，革联会确实很快这样做了。

关于沙市纱厂“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情况，5月10日出版的第十期《红岩》报第二版“棉纺六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调查报告”一文（西师八三一化学系校外野战队四月十七日撰写）有如下叙述：

六棉纺织兵团“于元月二十八日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党、政、财、文大权 / 但是……在四清运动中被列为四类干部的厂长王XX和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曾XX（保卫科长）、屈XX（厂办公室主任）等，惊魂稍定，又立即支使已垮台的工纠中的顽固分子，于二月二十三日拼凑了一个新的保皇机构——重棉六厂‘二七’分团…… / 六棉‘二七’分团，在革联会和区XXX部长的支持下，于三月十七日晚，借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到该厂‘镇反’为名，行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进行反夺权之实。当时区公安分局的政法兵团何XX说：‘把章交出来！如果他们夺错了，我们帮你们夺回来。’当晚革联会也去了三人，其中王庭学（一直隶属于八一五派的工人组织“二七兵团”一号头目——笔者注）也表态说：‘二七分团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有些缺点和错误’……以后王XX（厂长）等一小撮混蛋，还拉大旗作虎皮，欺骗群众说：‘三月十七号夺权，警备司令部是支持的。当时就是早夺了两个钟头，若迟两个钟头，警备司令部还要派一排人来支持夺权。’”

关于上述过程，和4月16日出版的第十期《山城战报》四版消息所报导的大同小异，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在此不赘引了。关于反复辟夺权，《山城战报》的消息则有如下报导：

“四月三日，市革联会组织六中三二一一一战斗团、三中抗大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单位部份战士开始进厂，配合着该厂的广大革命战士，一面调查研究，一面大造声势，协同作战，在兵团战士的凌厉攻势下，几天之内，厂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的御用组织、纯‘工纠’变种——六厂二七兵团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四月七日，兵团战士在毛纺厂红岩战斗团等革命组织的协助之下，把大权重新夺了回来，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手中”

这篇文章肯定是我写的。之所以印象特别深，不为别的，就因为我觉得棉纺六厂太远：位于九龙坡对岸的李家沱。大学时期担任业余美术队队长，每年都要找借口组织同学到四川美院参观。从沙坪坝到美术学院所在的黄桷坪本来就够遥远了，而李家沱，从黄桷坪还要前行，到了九龙坡，还要乘船渡江才能到达。美院同学的写生画中有那么多薄雾漫漫的九龙坡、灰蒙蒙的长江和江对岸依稀可辨的李家沱，而我，直到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了，才因了纺织厂的公案，第一次去了那儿，周围的景色自然十分新鲜，所以我能肯定这则消息是我写的。连带的记忆是，为该消息配发的评论员文章：“革命尚未成功，刀枪不能入库”也是我写的。

这则长消息的眉题是：“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长革命左派志气，灭阶级敌人威风”；正题是：“纺织兵团六厂战斗团痛击反革命逆流”。副题是：“他们重新掌权，扬眉吐气，振臂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消息和评论员文章共占了一个整版。顶头通栏是毛泽东语录：“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可谓气势汹汹了。

相比之下，《红岩》报的调查报告对于造反派的重新夺权的记录就很显无奈，有点言不由衷了。报告只在最后一段轻描淡写地谈到：“虽然在四月七日，革联会的人来假惺惺地支持六棉革命造反军‘红日’纵队和纺织兵团把权夺回来了。这是真的支持吗？……现在工纠变种六棉‘二七分团’在高叫要砸烂革联会！他们又是真的反革联会吗？不！是周瑜打黄盖，在演双簧，迷惑群众，革命的同志们！警惕啊！”

按常理推断，既然革联会那么一本正经，而且完全公开地把“二七兵团”打成“右派”，打成“阶级敌人”，——需知：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人最高级别的政治定罪——罪犯可能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宣判者“演双簧，迷惑群众，”吗？几十年后，如果要实事求是地叙述这件事，我以为只能这样说：当权者为了表示自己对于毛的忠诚，不能不把真心巴结他们的重棉六厂“二七兵团”一脚踹回他们原来的位置；“二七兵团”为了表示自己对于毛的忠诚，不幸而成为了政治游戏的牺牲品；那个撰写调查报告的西师八三一化学系校外野战队呢，不幸的是，偏见让他们跑得比无知离事实更远。至于我，则因为这篇文章，莫名其妙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生活故事。

整个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4月17日，我和报社编辑冉隆太一道去灯泡厂采访。该厂保守派的“反夺权”在重庆的代表性仅次于六厂，而且对该厂造反派的“平反”——据说——是革联会军方代表54军首长白斌副军长亲自前去处理的，足见对此事的重视。行前，我和冉先找革联会军代表郝子义了解情况。郝，54军某处副处长，在革联会分管政工。郝身材魁梧，络须满腮，很有军人的赫赫威仪，与亲善平和的刘润泉相比，正好形成强烈反差。1967年烽火连天的8月22日，郝同另三位副处长、一位处长分乘三辆吉普从市区返回警备司令部听报告，途经两路口，遭遇占据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砸派枪手的袭击，驾驶兵颇多战地经验，在公路上绕“之”字作狼突虎奔，全速驶离射击区，皆因火力过猛，仍有多人中弹，死处长1人，伤副处长等5人。郝很幸运，仅击中腹部，大肠外流，经救治后无大碍。后54军调防云南，郝继续派地方支左，在昆明市革委会分管政工。另一副处长曾惠民股骨被击中，整条大腿截肢，后任昆明军区总医院党委书记。我在昆明时曾去看过他们，话说重庆当年，他们依旧感愤难抑。中印战争，打得那么

厉害，54军牺牲者最大不过营职，而重庆一日，竟伤亡六名正副团级大员！对于砸派的怨尤，自然很难平抚。

且说我和冉走进郝办公室，正好有二人坐在沙发上与郝唇来舌往，语多冲撞却似不激烈。见我进门，郝乘机顺水推舟，向二人介绍道：“他就是报社的，你们问他吧！”我正觉奇怪，二人已经发问了，说：“重棉六厂的文章是谁写的？”我快语答道：“我写的。怎么啦？”来人于是大声叫好，说今天要找的就是你！要找的就是你！你快快给我们平反！我明白怎么回事了。遂反问：“谁打你反革命了？”我毫不示怯，我说：“处理六厂复辟是革联会的决定，你找我有什么用？”“我们就找你！”目标既定，对方不依不饶了：“你把我们两千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坚定不移地大喊大叫：“我们就找你平反！”

只是，毕竟在政府领导机关，毕竟我的态度十分强硬，更重要的是，对方毕竟保守派出身，保守派在单位里一般都是领导的乖宝宝，敢于斗胆来市府找麻烦，已经就很难为他们了。二人和我纠缠半天，实在拿不出半点杀着，只好讪讪撤退。撤前，二人壮胆问我名字。我得意洋洋，宣布：坐不改名，走不改姓，我叫周某某。二人悻悻走了。

大约第二天，革联会即通知我作为报社代表去六厂听意见。同行的是分管政法或者组织的军代表，李姓，瘦而高，不苟言笑，一付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这次是革联会派车专送，我们很快便到了九龙坡，渡长江，上了李家沱。六厂几百职工等候已久，球场上黑压压一片，我们一下汽车，要求“平反”之声便不绝于耳。为首的那天曾在郝办公室见过，他把我们领进一间屋子：很大，象是食堂，还没落座，跟涌的人便已将我们二人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平反的口号声又铺天盖地，震耳欲聋。进场，落座，我莫名其妙想起了古老的三国故事：关云长单刀赴会。我记得当时我很平静（反正有军代表压阵）。再说，他们全是些老保，老保就只会嘴巴上嚷嚷而已，口号喊破嘴皮又怎奈我何？会场组织得糟糕透顶，看不出谁主持？谁拿主意？反正就任凭群众一个劲儿地乱吼乱叫。李代表正襟危坐，以逸待劳，我也正襟危坐，以逸待劳。老保们有点儿害怕惹出反军嫌疑，不敢怒对军人，于是呢，叫骂声便全冲我一个人来了。吼去叫来，无非还是要我平反，还是骂我黑笔杆、烂笔杆、臭文人、死文人等等。待到大家吼得差不多了，军代表这才一声断喝：“革联会派我们来听意见，你们谁说，谁就说呀！乱嚷嚷干吗？”

满场顿时鸦雀无声。好一会，又有勇者带头吼叫，满场马上又此起彼伏了，口号声再度山呼海啸。待到又吼得差不多了，军代表再次断喝：“我们今天专程来听意见，你们乱吼什么？你们没诚意，我们现在就走！”

这回没人害怕了，反正会场没人主持，军代表话音刚落，喊叫立刻启动，而且吼声更劲。军人已不耐烦，金刚怒目，拍案而起，宣布：“你们既不想说意见——小周！咱们走！”

这一猛拍，真地个又把四周吓坏，会场再度鸦雀无声。军人已拉我出场，人们只得退潮一般乖乖闪出一条路，让我们大摇大摆走了。这时我才发现围攻者如此之多，从大厅一直挤挤地排到球场：我们的车就停那儿。工人们继续抓紧时机对我吼叫，依旧是要我平反和臭文人烂文人之类，只是加入了若干口水——就是没人动手。关上车门，我们便轰隆隆溜之乎也。我在心里暗自庆幸：多亏老保！多亏老保！

只是事情并没有完。

事后第二或者第三天，上午，编辑部正开会，两个不速之客上楼来了，怯生生向众人发问，说周某某在不在？前次的上访者记住了我的姓，但对我的名字却只模模糊糊记了个音，故而来客所报二字都不正确。正主持会议的军代表问他们找谁，他们又重复了一次——军代表马上回

绝了，说，报社没这个人！接着继续开会。二人无奈地下楼走了。

过一会，又换了两人上楼，又问周某某在不在，依旧怯怯生生，依旧把我的名字报错了。军代表依旧很快回绝，二人又悻悻地下楼去。会议继续进行。只是我自个儿心里却暗暗有所预感，他们肯定是找我麻烦来了，编辑部就我一人姓周。而且来人肯定就是重纺六厂的。我担心意外事情就要发生。

果然，下班下楼，窄窄地坝已被人群围得满满宕宕。其他编辑先走了，我、军代表和刘福最后出现，顷刻间被团团包围。有人已经辨出我来，于是大吼：“就是他！就是他把我们两千革命职工打成右派！”我们三人是被分割围困的。对军人不敢造次，很快放行了。军人顺势把刘福拉走，接着来拉我，但已不可能。我被围得里尤其紧凑，局面是一人对数百，无法脱身了。我孤军奋战，问道：“你们要干什么？”今天的抓人行动组织得挺好，没谁乱吼了。为首的肯定告诉我：

“要你跟我们回去！”

我问：跟你们回去干吗？

回答：给我们两千革命群众说清楚！平反！

对抗是没有用了。我爽快回答行。但我必须吃了饭才能出发。

大院里已看不见人来人往，没有谁可以对我施以援手，唯一的办法只有拖延时间，再寻机会。老保确实就是老保，为首者姿态很高地说了：“行，我们就等你吃饭。”他通知弟兄们原地等候，接着亲自带彪形汉子数位陪我一道前往食堂。一路上，首领明确威胁：把话给你说清楚，到了厂里，群众对你的态度不满意，发生了什么过激行动，我们是不负责任的。我毫不示弱，也威胁他：我出了事，你敢不负责！一路舌战，走进机关食堂，食堂早已空无一人。径直打了饭菜，我一个人便开始轻嚼慢咽。我当然吃得极慢，因为我根本不是吃饭，而是借机观察动静，拖延时间：情况已经清楚了，食堂所有大门都被彪形汉子封锁，逃跑已经完全不可能。

几十年后，如果有谁要我说说市委机关食堂的印象，我想，那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前市委书记任白戈。任早在七月份就被中央文革通过报纸点名，打下去，真正算得是“死老虎”了。其他书记常委什么的，全都宝贝似地被群众组织东一个、西一个地抓去监管起来，而他，谁都不想管，交给革联会一放了之，反倒有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他和我们在同一食堂搭伙，凭票吃饭。食堂大，至少有二三十张桌子，条凳多已损毁，后来者打好饭菜往往只能站着吃。不管有无空凳，任白戈反正是只能站着吃饭的，而且听炊事员说，领导早有交代，对于该罪大恶极的走资派，只能卖给低价位的菜，如清水白菜之类。我曾有意识靠近他吃饭以作近距离观察，有时干脆就把菜端过去和他放同一张桌子站着吃。他的碗里果然每次都清汤菜肴，而他每次都吃得极负责，满嘴咂咂有声。他的心态绝对正常，我想，因此呢，虽陷逆境而身体依旧硕壮如初，只是胡须常不剃刮，如秋草之零乱，显出了有多落泊，像大字报漫画上的丑形。我如此观察他完全出于好奇。因为66年8月我曾写过一篇大字报，便描绘了此公的住房。那年代成年累月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学习大庆“干打垒”精神，先生产后生活什么的。可此公常住人口好像就仨（他，夫人华逸，还有一个上音乐学院的宝贝女儿），却住了花园一院，别墅两幢，一中一西。其间小廊回合，曲径通幽，道不尽的幽静闲适。那时他已下台，人去楼空，胆大包天的中学生便逾墙而入，把他的公馆整个儿打开办了个展览，而这个展览让众多在“干打垒”和准“干打垒”里艰苦度日的山城老百姓大开眼界，一如当初党委组织大家看阶级教育展览，据说，有工人还当场大放悲声，说真是修了真是修了，如此下去，劳动人民真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我曾就该展览会写过一份传单，题目就叫：《六十年代的地主庄园》，传单后被选入1967年11月革联会“斗批改指挥部”编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任白戈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录》。传单专门提及，说任的屋子里有“电扇6台，梳妆台1个、收音机3架，地毯13条，缝纫机1台，海绵运动垫2张……”这一连串数字当时实在让人咋舌。重庆造反早、造反派多，任白戈公馆展实在功不可没。

机关食堂给我印象深的第二件事，就是六厂人员抓我那顿午餐。彪形大汉严把各个大门，我还有何心思吃饭？因为故意延宕时间，所以对食堂就观察得特别仔细。我第一次发现食堂那么大，空旷，任何小小动作，都会引起空空回响。大汉们发现我饭已吃完，于是急不可耐地催促上路。其时，大院小路还不见人走影动，离上班时间一定还早，于是我又找借口说，六厂的事情具体由组织部门人员经办，必须找他们和我一起去才能处理。呆头呆脑的老保们又非常宽厚地同意了。

大汉们再次跟我在大院里乱窜。当时，我满脑子都是抗日影片中游击队的“磨菇战术”，我别有用心地带他们到处兜圈儿玩，故意找些根本没人的房间，冬冬冬冬乱敲一气，确实无人应答，马上又另找一间再敲。左串右跑，对方终于发现了我的阴谋，不准我再敲了，只管紧催上路，并且继续预告说群众将会有过激行动云云。正在绝望，厕所却突然在我前面出现，我顿时惊喜万分：因为只有我清楚，厕所后的隔墙正在维修，扒开了一个大缺口，从正面是看不见的。我克制住跃跃急切之情，镇静地通知对方说：“行，我走。我去厕所解解小便，解了就走。”

除了保守派工人的老实巴交之外，剩下的就是我的运气了。大汉们傻呆呆地等在路旁，我却已身手矫健地翻越厕所围墙，溜之乎也。墙后是市委领导宿舍区，一幢幢小楼掩映在初绿的林中，我如脱笼狡兔，破网游鱼，一口气急穿而过，心中说不尽的紧张与快愉。其实，翻过围墙那一刹那，我就确信已经脱险，但我还是跑得很快。我个子瘦小，体育活动的唯一强项就是长跑。这个好习惯一直坚持几十年，至今能在老迈之年保持旺盛精力，盖得益于斯。穿出宿舍区，下坡，是一溜烟的石阶，左边是科委机关，右边又是什么的，这些我全熟悉，跑到底，面前就是巍峨高耸的人民大礼堂了。正好有公共汽车开来，我跳上去，直奔望龙门码头，然后上轮渡，船行大江，长风浩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在南岸姐姐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回学校呆了两天。报社是有电话的。大约当时信息意识差，我没打电话，到第三天下午，径直便又回市委大院去了。从上清寺到市委大院，几百米长的路上人头拥拥，极多，走进大院，人更多，熙熙攘攘，像是赶农贸市场。反正那段时间来此走访寻事的人很多，我自不在意。匆匆忙忙登楼，刚进办公室，刘福就惊诧喊起来，道：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怎么啦？不可以回来？他说：你没看见下面这么多人？我说：看见啦。他一声长叹：坏了！那些人就是抓你的！在下面静坐好多天啦！声援的、轮班的，人越来越多了！

全编辑部的人都为我没被发现而庆幸，又为我如何脱身而忧心忡忡。很快商量对策，最后，想了个主意，立即派人行动。编辑们下楼去，不知在哪儿找来一架很长的竹梯，悄悄绕出大院，进了报社侧面的一户居民院内，从那儿把竹梯迅速架了上三楼：我于是神不知，鬼不觉，援梯而下，穿出居民院，出门，上坡，又趑趄上市科委旁那片山坡，顺三天前逃命的路径再度直奔望龙门码头，再次渡过长江避难去了。

重棉六厂的二七兵团，后来正式成为了坚强的“反到底”派，即砸派。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总编：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